

走进世界 · 海外民族志大系

高丙中 / 主编

社群、组织与大众民主

印度喀拉拉邦社会政治的民族志

吴晓黎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社群、组织与大众民主

——印度喀拉拉邦社会政治的民族志

吴晓黎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群、组织与大众民主：印度喀拉拉邦社会政治的民族志 / 吴晓黎著.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8

(走进世界·海外民族志大系)

ISBN 978-7-301-15602-5

I. 社… II. 吴… III. 民族志—研究—印度 IV. K35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6235 号

书 名：社群、组织与大众民主——印度喀拉拉邦社会政治的民族志

著作责任者：吴晓黎 著

责任编辑：丁超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5602-5 / K · 0608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pw@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25.5 印张 340 千字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凝视世界的意志与学术行动

能叙事才好成事。是表述主体才可能是社会主体。

“到海外去！”

“到民间去”，曾经是一个世纪前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发生期所酝酿出来的口号。先有具备学术规范的社会调查，才有社会科学的出现。在少数人一段时间的尝试之后，一句凝结着共同体集体意识的“到民间去”成为1919年之后的知识界的运动，在中国促成书斋学问之外的社会调查之风蓬勃兴起。社会科学诸学科此前在中国主要是课堂传授的西方书本知识，“到民间去”的调查之风呼唤着以中国社会为对象的知识生产，这种知识生产逐渐造就了中国社会科学诸学科。

今日的中国社会科学界则萌发着另一种冲动，一种积聚了很久、压抑了很久的求知之志，这就是：“到海外去”！

曾经，在大家都不能出国的时期，我们在政治关怀上满怀豪情地、当然只是浪漫地“放眼世界”。今天，出国旅行在中国已经大众化了，“看世界”的欲望已如春潮涌动。中国的知识界要做的是以规范的学术方式“走进世界”之后“凝视世界”！

关于社会调查，关于经验研究，“到海外去”预示着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机会。社会调查的眼界有多宽，社会科学的格局才可能有多大。几辈知识分子在“民间”、在本土开展调查研究，奠定了中国社会科学

的当下格局。我们今天到海外去，到异国他乡去认识世界，则是为了中国社会科学明天的新格局。

到海外做民族志

中国人出国，在“镀金”、“淘金”、“挥金”之外，新增加了一个目标，这就是扎在一个地方把它作为一种社会、一种文化来观察，然后写出学理支撑的报告，名之曰“海外民族志”。虽然到目前只有十多个人怀抱着这个目标走出国门，但是它的学术和社会意义却不同凡响。

海外民族志，是指一国的人类学学子到国外（境外）的具体社区进行长期的实地调查而撰写的研究报告。这种实地调查应该符合人类学田野作业的规范，需要以参与观察为主，需要采用当地人的语言进行交流，并且需要持续至少一年的周期。

在西方人类学的正统和常识中，民族志就是基于异国田野作业的研究报告，“海外”是民族志的题中应有之意，所以它们是没有“海外民族志”这个说法的。

人类学民族志的标杆是由马林诺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玛格丽特·米德那批充满学术激情的青年才俊在1920年代出版的著作所树立起来的。他们各自从伦敦，从纽约背起行囊，乘船出海，到大洋中的小岛和“野蛮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完成了《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安达曼岛人》及《萨摩亚人的成年》等经典的民族志著作。他们是第一批靠民族志成为人类学家并进而成为学术领袖的人物。他们的职业生涯成为人类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的模式。做民族志，总要有充沛的激情让自己想得够远，走得够远。在拥有成千上万的人类学从业者的西方国家，即使后来在国内社会做民族志的人逐渐多起来，但是，到海外做民族志还是一直被尊为人类学人才培养的正途。

但是，对于中国的人类学共同体来说，民族志一直都是一种家乡研究，一种对于本乡本土、本族本国的调查报告，因此，“海外”从来都是

中国人类学的民族志所缺少的一个要素，所未曾企及的一个视野，所没有发育起来的一种性质，当然也是今天绝对需要的一种格局。

一般都说中国人类学已经有百年的历史，我们现在才有组织地把田野作业推进到海外，这项迟来的事业让我们终于可以跨越百年的遗憾。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等具有人类学专业的国内高校正陆续把一个一个的学子送到海外开展规范的田野作业。

中国学人到海外做民族志的时代尽管迟来却已经大步走来！

作为表述主体的共同体

一个共同体，在关于世界的叙事中所占的位置与它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是关联在一起的。民族志是共同体对共同体的表述地位、能力以及主体性明确程度的知识证明。

学术是用文字表达的抽象观念。文字是个人一段一段书写的，但是抽象观念却不是个人意义上能够成立的。学术是共同体的衍生物、伴随品。——共同体造就学人，共同体产生知识兴趣、共鸣群体（读者），共同体传承学术成果。反过来，学术则催生新的共同体或促成共同体的新生。

具有集体意识的共同体必须是表述者，必须是能够言说自我、言说他人的表述者。民族志是关于共同体表述地位是否存在的证明，是共同体通过特定的表述得以构成或显现为主体的知识途径，是共同体的表述者身份的名片。

虽然民族志的主笔者是个人，虽然民族志的材料来自被访谈的个体，虽然一部一部的民族志都有各不相同的具体内容，但是在集合起来的总体效用，民族志承载着共同体对共同体的结构性关系。西方与东方的关系、与非洲和拉美的关系，既是由西方所生产的器物所支撑的，由西方的武器所打出来的，也是由西方关于非西方世界的叙事所建构的。这种结构性关系是难以改变的，但不是不能改变的。改变，只能由器物

生产的实力和叙事的表述能力所构成的合力来促成。

在前现代，作为表述者的共同体是各自说话，并且主要是自说自话，偶尔才说及他人，对他人的表述和自我表述都难以直接影响他人社会——即使慢慢偶然传播到他人社会了，影响效果也总是以缓慢而曲折的方式发生。

在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兴起，尤其是民族志的兴起，造成了一种知识后果，这就是群体作为自我与作为他者都被置于同一个表述所组成的社会景观之中，置于西方作为世界中心的这个社会结构之中。从视角来分析这种社会结构的知识关系，西方之所以处于世界的中心是因为几乎所有的观察者、表述者都是从西方往外看的。也就是说，从民族志来分析，作者都是西方学者或者学习西方的学者，而文本内容所叙述的都是非西方社会的事情；在共同体层次，西方是凝视者，非西方是被观察对象。知识的社会后果早就凸显出来：关于他人社会的叙事不仅在不断满足西方大众的猎奇之心，而且在知识和社会观念上不断强化我群与他群的一种中心-边缘的结构关系——如果我群与他群的相互表述是不平等的，这种结构关系也是不平等的；如果相互表述是极端不平等的，那么这种结构关系也是极端不平等的。民族志的作者在自己的社会中不过是一个普通学者，而在共同体的关系中却支撑着其共同体的优越地位。西方作为民族志叙事的主体，同时也成为普遍主义思维模型的创立者，普世价值的申说者、裁判者，世界议题的设置者。

不过，后现代的世界给人类带来了新的机会。这一波来势汹汹的全球化，也是世界各个共同体、各个层次的力量和关系的再结构化机会。意识形态批判使西方中心主义得到深刻反省，新技术、新媒体与人口流动使关于他人的叙述不再能够作为一面之辞而成立。更多的共同体能够在国际平台上成为关于世界的叙事者了，世界真正变得紧密了，于是，共同体的代表者对自我的表述与对他人的表述都会同时影响自我和他人在结构中的位置和关系。共同体在全球社会景观中的位置和关系是由代表者的表述和他们参与的表述的总和所塑造的。

中国学者是一个后来的参与群体。“后来”有遗憾，但是后来者必然有不一样的机会和优势。

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

西方人类学家打造了民族志的镜子，用它来审视非西方社会；我们从西方拿来民族志方法的镜子，我们几十年来只拿它观照自己。现在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民族志方法其实是一把多面镜，它可以观照我们，其实更方便观照我们之外的世界。

共同体的社会科学是要靠关于社会的叙事来支撑的。支撑西方社会科学的是关于全球范围的社会叙事，而支撑中国社会科学的是限于中国内地的社会叙事。相比较而言，西方社会科学是以西方为中心看世界，而中国社会科学是以西方的学术眼光看中国。西方学者跑遍世界，当然也跑遍了中国各地，撰写了成千上万的民族志，建立了关于世界的叙事；中国学者也出国，当然主要是到西方国家，但是十分耐人寻味的是，他们把西方只是当作一个大学，那里只是求学的知识殿堂，并不是他们做田野调查的地方。他们回国才做调查研究。

中国追求现代化一百多年，几辈学者介绍了几乎所有的现代化国家的思想和理论，但是从来没有为国人提供特定的现代社会在社区层次的实际运作的经验知识。现代社会具体是怎样的？现代生活对于个人如何是可能的？中国的社会科学没有认真提过这种问题，中国的人类学也没有当作使命来回答过这种问题，当然就一直没有相应对象的民族志出现。

毫无疑问，中国的社会科学也是以追求真理、认识人类社会的科学规律来自我期许的。但是，中国在近代以来主要是在政治、军事上纠缠在国际事务之中，在学术上因第一手经验研究的缺乏是处于国际之外的。我们也关心亚非拉人民，也声援发达国家的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正义事业，不过，这大都是在政治、道义上的努力。在知识产业上，中国的社会科学一直都是一种家庭作坊，是一种自产自

销的格局：学者们在自己的社会中发掘经验材料，以国内的政府、同行、大众为诉求对象。一些学科也涉及国际世界，甚至以国际社会为论题，但是基本上都是站在（或藏在）中国社会之中对外人信息间接引用与想象的混合物。没有进入世界的田野作业，没有关于国际社会的民族志作为支撑，何以以现实世界为调查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

中国的社会科学，从关于中国、关注中国社会、关心中国发展的社会科学，到认知全球社会的科学，必须从最基本的海外民族志个案积累开始。中国学界的海外民族志将逐步建构中国对于世界的表述主体，中国将从民族志观察的对象转变为叙述世界的主体。在国际社会科学中，中国从单向地被注视，发展出对世界的注视，以此为基础，作为表征社会知识生产关系之核心的“看”就必须用“注视-对视”（也就是“相视”）的范畴来对待了。获得社会知识的单方面的审视总是被抱怨包含着轻视、敌视，但是“对视”以及作为其产物的相互表述的民族志将在国际社会之间造成“相视而笑”的效果，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期盼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结果。

以中文为母语的人口与中国人口都在世界上占最大的比重。中国学人和中文加入到关于世界的实地调查研究中来，世界社会科学无疑将因之大为改变。更多的参与者、更多的视角看世界，看彼此，被呈现出来的世界将会大不相同。

展望中国社会科学新格局……

因为心中有春天，我们看见嫩芽会欢欣。

海外民族志训练是未来的人类学家出师的汇报演出。没有人指望其中有多少大师的代表作，但是它们无疑都是地区研究的一个区域的开拓性著作，更加确信的是，它们的作者是中国人类学乃至社会科学在国外社会大展经验研究的开路先锋，是为我们的共同体在知识世界开疆裂土的功臣。它们的作者从熟悉的家园到远方、到异国他乡而去，拓展了

中文世界的空间。它们从社会知识生产的源头而来,就像涓涓溪水从雪山而来,假以时日,配以地势,必将汇聚成知识的海洋。

我们年青的人类学者已经走进世界,在泰国、蒙古、马来西亚、印度、澳大利亚、美国、德国、法国、俄罗斯、巴西、香港、台湾等地,深入一个社区进行起码一年的参与式社会调查。他们会带动越来越多的学人参与,世界上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中国学界的关注点。他们陆陆续续地会完成自己的民族志成果,用中文书写当前世界各种社会的文化图像。他们的民族志个案今后可以组合成为对于发达国家的社会研究,对于金砖四国的综合研究,对于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基督教社会的比较研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特别期盼对于非洲大陆、阿拉伯世界、太平洋众多岛国的研究,特别期盼对于周边国家日本、韩国、缅甸、越南的研究……

海外民族志在中国的广泛开展,将改变中国社会科学单一的学科体制。中国社会科学按照学科划分为政治学、法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人口学、民俗学……,分属不同学科的学人要开展合作,并没有学科体制的平台。民族志比较发达的那些知识共同体,如美国、日本,在学科分列的同时还有一个地区研究(area studies)的体制。在学科与地区研究并行的体制中,大学教授分属不同学科的院系,但是相同的地区研究兴趣又把不同院系的教授联结起来。这个方向的发展是以关于国外社会的民族志为基础的,但是却不是人类学家单独能够操作的。我们刚刚开头的海外民族志事业对于中国社会科学派生“地区研究”的机会却是靠整个学界才能够把握的。

海外民族志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领域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在学术上也会更上一层楼。海外民族志除了在共同体层次上、在整体上对于社会科学的重大意义之外,在技术层次、操作层次对于社会科学的影响也会是很实在的。从业者只在中国社会做调查与同时在海外社会做调查,代表着不同的眼界、不同的事实来源。更开阔的眼界对于议题的选择、对象的甄选、观念的形成都会更胜一筹。学术的精进总伴随着寻

找更广泛的社会事实来源，由国际社会经验比较所支持的论说可能更加有力。

相对比较紧迫的是，海外民族志是疗治中国社会科学严重落后于时代的病症的一剂良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学者却只在本国的社会中做实地调查。中国把大量资源投入到外语学习上，却没有几个人是计划学了语言去国外社会做调查研究的。中国的商品拥挤在全世界各地，可是它们总是置身在陌生的社会被人用怀疑的眼光打量、挑剔，中国学界没有能够及时为它们创造各个方面都能够熟悉的知识环境。中国大众旅游的洪流已经从国内漫延到国外，在世界上浮光掠影的观光所型塑的世界观是极其偏颇而危险的。所有这一切都在期待中国社会科学的世界眼光。

凝视世界的欲望需要走出去的意志来展现。人类学者是共同体的眼珠子——它们被用来看世界，看社会，看社会世界，看世界社会。有眼珠子就能够看，有心才能够凝视。人类学者也是知识群体的脚板子——它们要走很远的路，走很多的路，走陌生的路，也就是走没有路的路。有了这样的人类学者群体，一个共同体的社会科学才能走得够远，看得更远。

高丙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北京大学人类学专业海外民族志项目负责人

2009年7月4日

序

喀拉拉之旅：基层民主实践的民族志

郭于华

摆在面前的《社群、组织与大众民主——印度喀拉拉邦社会政治的民族志》一书，篇幅不算厚重内容却关涉重大的学术与社会问题。大约一年前我曾经参与了这部博士学位论文的答辩，再次阅读依然引发许多思考和联想。

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作品，首先在于其中有吸引人们思考、让人想知道答案的问题。作者在开篇就指出：喀拉拉的人均国民收入低于印度其他地区、没有工业化，却在社会发展方面尤其是健康和教育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具体表现为：喀拉拉是印度“第一个全民识字的邦，第一个进行土改的邦，人均预期寿命最高的邦，出生率最低的邦，婴儿死亡率最低的邦，唯一一个村村都有医院设施的邦，通信设施覆盖率最高的邦”。如果这些“第一”和“最”都是确实的，那么人们当然想知道为什么。如果说一些研究喀拉拉邦政治社会的学者主要从民主政体、公民社会和政党政治来回答这些问题，吴晓黎的这部作品则试图以喀拉拉邦的一个村庄——稻乡为个案，通过对多元、复杂的宗教信仰、种姓、族群如何在民主宪政框架下经过互动形成公民社会与现代政治理念过程的讨论，从而给出回答的。她向读者展示，正是经由复杂多元却又得到大众认同的朴素的宗教伦理、经由世俗的普遍主义文化和政治认同，当地的地域—文化共同体得以整合。特别是公民社会的构成和广泛参与的民主政治通过民意表达和各种中介机制协调了社会矛盾，保持了社会的动态平衡与发展。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不仅要回答一个高度分化的、有着错综复杂矛盾的社会如何整合的问题，也同时涉及如何理解“发展”的

问题——喀拉拉的个案至少告诉人们，高经济增长率、高 GDP、高人均收入与高消费并不一定意味着发展，更不一定能够持续地发展；而社会方面的进步，特别是健康和教育领域的成就——食品和营养安全保障，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均衡的男女性别比，生育率的自然下降，较小的城乡差别，更长的学习时间和更广泛的阅读习惯，更畅通的民意表达和更广泛的政治参与，等等，更为人性化的改善，才是“发展”的真正要义。

这本书的吸引力还在于它不仅是一本政治民族志，而且是由中国人类学者在田野工作基础上写作的海外民族志。在许多中国人的印象中，印度是一个古老、神秘、充满东方色彩的国度，人们可以从文学、影视、媒体等渠道看到这个异国邻邦的一些画面、色彩，但是其内在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其社会构成和运作的逻辑以及这些逻辑如何影响着其民众的生活世界，外人却无从感知。对于他者世界和异文化的好奇自人类学诞生以来就是探究其详的动力，它支撑并推动着人类学发展的百年历史。这部以印度喀拉拉邦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志当然体现着这种社会人类学的精神内涵，而对于中国的社会（文化）人类学而言，更有其深刻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众所周知，由于长期以来特殊的制度、文化背景与学术传统，中国人类学的发生与成长受到体制与文化的独特塑造和制约，其研究对象多是以村落社区为主的汉人社会和以少数民族为主的族群社会，而以真正的异国他乡为探索对象的研究则稀少如凤毛麟角。在这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海外民族志系列之一的作品中，吴晓黎对印度喀拉拉邦社会政治的细致探讨，与其他相关的研究一道，对开创中国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研究是有益的尝试，对于中国人类学的成长进步和国际化亦有推进之功。

不难想象，研究者作为一种异文化的局外人（outsider），在融入田野过程中由于语言、文化、环境、习惯等的差异难以避免地遭遇种种不适、震惊、困惑、尴尬甚至沮丧，这些困境和磨难对研究者而言既是挑

战也是培养,经历这一切是人类学者走向成熟的必要过程,也称得上是人类学者的成年仪式。而作为局外人在异文化中除了上述劣势之外也有其优势,这就是对当地人可能已经司空见惯、视作平常的社会文化事项的敏感,即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敏锐地捕捉日常生活中那些细致微妙同时体现着该文化本质特征的蛛丝马迹,并且将其内在逻辑和意义清晰地呈现出来。从吴晓黎的民族志记述中能不时感受到这种敏锐,例如对于喀拉拉邦稻乡文化多元性的感知和描述,这种多元文化体现在世俗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许多方面:经济活动的多样性,宗教、语言、种姓、族群、社会组织与党派的多元共存,特别是,这些复杂多元的存在是如何在人们有意识的民主实践中形成具有张力的共同参与的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又如何改善了人的生存状态的。我想,对于文化与政治现象的敏感和穿透现象与本质的能力也是这部民族志作品成功的原因之一。

作者呈现的印度与中国社会的可比较性也增加了这部民族志的吸引力。不难理解,印度与中国有诸多可比之处:同是文明古国,同是发展中的大国,彼此相邻而且同样面临人口众多与资源相对匮乏的巨大矛盾,在迈向现代文明的过程中都存在诸多社会矛盾与困境……;差异性的对比也十分鲜明:政体、制度、政策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与速度的差距,而人们最直观的印象可能是印度的“多”、“乱”和中国的统一、整齐,在当今中国常能听到对印度社会的负面评价。对其所谓“民主的乱象”,一些学者和主流媒体不时表现出一种优越感,以己优势去比较对方的劣势,而对印度社会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可贵探索,吴晓黎以描述喀拉拉人民社会与政治生活的丰富翔实的第一手材料,向我们展示了基层民主的实践过程,表明当地社会的进步,特别是对公平与社会正义的追求、有关政策向弱者的倾斜和对弱势群体的扶助,恰恰来自于公民参与的民主政治。在喀拉拉,民主是一种结果,但更是一个过程,一种探索和实践,也就是说,民主正在路上。

对印度基层民主实践之旅的描述,会引发更多的关于民主政治的思考。我们很自然地会想起著名学者阿玛蒂亚·森关于民主价值观“放之

四海而皆准”的论述：

若要在20世纪里发生的诸多进步当中选择一项最重要的，那么，我会毫无困难地指出，那就是民主的兴盛。……在整个的19世纪里，民主思想的理论家们觉得，议论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国家是否“适合于民主制度”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直到20世纪，这一看法才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承认，这样提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根本不需要去判定一个国家是否适合于民主制度，相反，每个国家都必然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变成适应民主制度的社会。这一变化的确是个重大的变化，它把民主理念潜在的影响扩展到了历史和文化各不相同、富裕程度千差万别的数十亿人当中。人类社会已经公认，民主制度是普遍适用于各国的，民主的价值观也被视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是思想史上的一场重大革命，也是20世纪的主要贡献之一。

这位生长于印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专门谈到了“印度经验”：

印度的民主政治历经甘苦，已卓有成效地奠定了巩固的基础。在这段时间里，政治上出现的分歧大体上都按照宪法的准则来处理，并且坚持根据选举结果和国会的规则来组织历届政府。虽然当年印度这个国家是由各个差异极大的地区马马虎虎、勉强强地仓促组合而成的，但它不但存活了下来，而且，作为一个建立在民主制度基础上的政治体，运转得相当良好。确实，印度的各个部分正是通过有效的民主政治体制而结为一体的。

喀拉拉的民主实践同样没有错过他的视野：

喀拉拉邦现在的生育率为1.7%，与英国和法国差不多，却比中国的1.9%低。这种结果并非通过强制方法达到，而是由于社会形成了新的价值观，而政治对话与社会对话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喀拉拉邦民众，尤其是妇女的文化水平较高，这也

是社会政治对话成为可能的重要因素。(阿玛蒂亚·森:《民主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

相形之下,在我们的社会中经常可以听到对于民主制度的质疑或恐惧,例如,“民主强调甚至崇拜多数,有可能成为多数人的暴政”。其实只要稍微关注一下历史与现实,就不难意识到,包括中国社会在内的世界范围中,暴政究竟是更多地来源于权力,特别是不受约束的权力还是来源于多数人?被暴政所加害的对象更多的是享有民主的公民还是专制、独裁治下的臣民、子民?

还有一种说法是“民主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这更是一个不能成立的命题,并没有人声称民主制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也没有人说民主是十全十美的,实行民主制度的社会也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但是民主可以通过最广泛的公民参与“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所以说,民主至少是目前解决问题的最不坏的方式。

经常看到有人在担心或恐惧“民主的滥用”,就此我想到的问题是,民主对于中国社会而言究竟是缺失还是滥用?没有的东西又如何滥用?我们不会忘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几十年所要争取的就是人民的民主和自由。中国越是缺少什么这些人就越反对什么、抵制什么的人,真不知是无所用心还是别有用心。

印度基层社会普通人民的民主实践再次表明,无论国情、特色、族群或文化差异都不能成为抗拒民主的理由。没有人天生地不适合民主或者甘愿被专制独裁统治。民主是人类对合理社会的探索,印度喀拉拉邦的人民实践着这样的探索,吴晓黎以民族志的方式记述了这一探索实践的过程,这对于同样在进步和探索过程中的中国人民无疑是有意义的。

在为这部民族志作品落笔写序的时候,正值奥巴马在民主选举中获胜而成为第56任美国总统。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任黑人总统,他的当选本身就是民主制度和理念的胜利和证明——“证明两个多世纪之后,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是不会从地球上消亡的”,正如奥巴马在其

获胜演讲中所言：今天晚上我们再次证明，我们国家真正的力量并非来自我们武器的威力或者财富的规模，而是来自我们理想的持久力量：民主、自由、机会和不屈的希望。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学术著作写序，既感荣幸也不免惶恐。但凡事总有第一次，更何况这本描述和讨论印度喀拉拉民主实践之旅的民族志让我经历了饶有兴味的阅读和感到探索问题的乐趣。以此为序，但愿没有辜负作者的瞩望。

2008年11月7日于北京